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大西北上空的阴霾

·勘分西北界约记 伊犁条约·

孙燕京 著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大西北上空的阴霾

·勘分西北界约记 伊犁条约·

孙燕京 著

(京) 新登字 156 号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大西北上空的阴霾

· 勘分西北界约记 伊犁条约 ·

孙燕京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编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960 毫米 32 开

字 数：85 000

印 张：4.75 插页 2

版 次：199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 000

书 号：ISBN7-300-01555-7/K·160

定 价：3.80 元

DG81/28

序言

● 李文海

迄今为止，辑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与世界各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协定之类最为详备的，还得推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三大册《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该书目录的，共计 1182 件，其中除最初 7 件订于 17、18 世纪外，其余均为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所订立。这些约章的情形自然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内容涉及国家的许多重要主权，有的则只是某个具体问题的细节规定；有的属两国政府之间正式签订的，有的则只是同某些外国企业、公司等订立的章程、合同、凭照。但不管怎样，综观这些历史资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处境，却是一目了然的。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些约章的性质，自然免不了也有人把它说成是“揭开了（西方）对华事务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一类的

话^①，但毕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来说，包括持有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大都肯定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些条约不是以平等国家之间的谈判为基础的，所以说它们是不平等条约。”^②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曾经给予我国近代历史以何种影响，我们打算先引用一位业已作古的中国人和一位现在仍然健在的美国人的话，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提供一点参考的素材：

漆树芬在 1926 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名《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比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钱，屠戮我民命，已成不可掩之事实。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最利于进攻之工具，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以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军阀则靠此不平等条约以酿成此循环式之内乱，所以这一部不平等条约，实为我之酸心疾致命伤。”“由是观之，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

① 参阅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第 3 页。

② 这类议论可以说俯拾皆是。这里引用的是伯斯：《远东——东亚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话。

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

准备引用的另一段话出自一位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的美国政要前些年出版的一本书，其中写道：“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你特地要引用这么两位人物所说的这么两段话呢？

确实，这中间并非没有需要说一说的小小的原因。

前几年，有位先生在一本颇有点名气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渲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另一位先生则认为，解放以来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谴责，是一种早就应该抛弃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使历

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他看来，殖民主义对东方历史“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对于如此高深的理论，浅薄如我辈者自然难以领会，那末，我们先听听第三者的议论。前面引用的两段话，虽然也颇有点对殖民主义“口诛笔伐”的味道，但就作者而言，前一位早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谢世，而且那本著作前面还颇有几位国民党元老为之作序；后一位本身就隶属“西方”，那本书又是以预言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为其主旨的，无论如何，停留在“感情渲泄”而淡化了“理性色彩”、甚至导致批判的“天平倾斜”之类的训斥，是决然不会加到他们身上去的。

“感情”和“理性”的关系，本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历史研究应该客观，所谓客观，就是要尽量探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历史。是不是一定要心如死灰、不带任何一点感情色彩，才能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倒怕也未必。因为不带任何感情这一点首先就难以做到。观察任何问题，也包括观察历史现象，总要有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或者叫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感情，谁也回避不了。譬如说吧，不满于甚至谴责“异族侵略者”的侵略行径，这自然是一种“感情”；但对殖民主义感恩戴德，认为它对被侵略国家的征服，不过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的普遍

福音，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情”？这两种不同的“感情渲泄”，究竟哪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实在不是靠自我的标榜，而要经受历史实际的检验。

话扯得稍为远了点，现在再拉回来谈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的掠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即达 2.3 亿两白银，赔款总数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日本国家四年半的财政收入。俄、英、美、日、德等 11 国通过《辛丑条约》，则勒索赔款 4.5 亿两白银。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是洋务企业中创办经费最多的一个，建厂时共支出银 580 余万两；也就是说，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可以建设大约 80 个汉阳铁厂，较洋务派创办全部洋务企业时投入资金总和要多出好几倍。

这里还只是就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一方面来说的。事实上，不平等条约是一条“屈辱的绳索”，从各个方面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捆绑得死死的，以便听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任意吸吮膏血，作践蹂躏。李育民同志在自己的论文中把不平等条约按内容归纳为如下六大类别：

（一）以租界制度和治外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侨民管理制度；

(二)以协定关税、协定内地通过税、内河航行通商制度、陆路边境免减税制度、苦力贸易、自由设厂制度、路矿借款担保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经济特权制度；

(三)以海关行政外籍税务司制度和海关兼常关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行政特权制度；

(四)以自由传教和控制中国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文化特权制度；

(五)以对中国实行军事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驻军制度；

(六)以在中国某一区域取得独占权益和领土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制度。^①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这些理应拥有的主权拱手送给别人，任何一个侵略者也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友好交往”就把这些特权轻易攫取到手。事实上，在每一个较为重要的不平等条约订立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曾动用兵舰大炮，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用野蛮的军事侵略（当然必不可少的还要伴随着政治讹诈、经济施压之类的种种名堂）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在谈到“天津条约”时十分形象

^① 见李育民同志于1990年8月提供给“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论略》。

地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因此，在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背后，几乎都蕴含着一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血泪斑斑的悲惨故事。

如果我们说，了解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我想是不能算过份夸张的。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这“血”流到了谁的身上，“失血”的中国人很清楚，吮血而肥者自然更明白。正是这损失惨重的“历史大出血”，才使得新中国的起步乃至今天的四化建设显得格格外艰难。而某些依靠在一个多世纪中大量掠夺世界各国财富而发家的强国的统治者，却在那里一本正经地指责或嘲笑中国经济“落后”的种种罪过，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历史无法割断。历史也就不应该忘却。

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一套“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的出发点。这一套书，打算选取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若干不平等条约，以一个或几个内容相近的条约写一本书，生动而形象地将条约签订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介绍给读者，一共准备出10册。每一册书既完整地反映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全部出齐后又可对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状况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编辑这一套书的计划，最初是晓虎、仰东、孟超几位年轻人提出来的。他们希望我和继先同志也参予此事，并担负主编的责任。我略加思索，也就欣然从命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同这几位青年分别有过愉快合作的经验，相互之间都比较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觉得这确是一件值得花些力气的颇有意义的工作，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理应把这看做是自己份内的事。其意义，我想江泽民同志在《浩然正气》的《代前言》中的一段话说得极为深刻：

“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过去饱经忧患的历史，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不了解，不熟悉，甚至有些年纪大的人也渐渐淡忘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必须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国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希望这一套书能在这方面也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日于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1	西线多战事·····	3
2	一个“阳谋”·····	12
3	塔城会议得与失·····	21
4	约成国土丧·····	33
5	玉门西侧燃烽火·····	42
6	海防塞防之争·····	58
7	“黑色”的里瓦几亚·····	75
8	国人皆曰可杀·····	88
9	受命于危难之际·····	95
10	艰难的使命·····	104
11	危机并没有过去·····	120
附录 1	主要引用书目·····	124
附录 2	勘分西北界约记·····	126
附录 3	伊犁条约·····	130
附录 4	改订条约·····	135

一百多年前的西北边疆，是一片辽阔的沃土。那里牧草丰、牛羊壮、水产富饶。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像三把利剑，横卧于新疆丰饶的土地上。北起斋桑泊（现哈萨克斯坦境内），西至巴尔喀什湖（现哈萨克斯坦境内），与东南方向天山脚下的特穆尔图淖尔（现名伊塞克湖、吉尔吉斯境内），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路的博斯腾湖，穿成了一串翡翠色的项链，戴在西北沃土的胸襟上。这里有数不清的河流，说不完的物产，道不尽的矿藏。另外，还有一条举世闻名的路横贯西北宝地。从古城西安出发，经过多风少雨的河西走廊，向西出嘉峪关，然后穿过漫漫戈壁，走天山南麓过喀什，再越过葱岭（亦称帕米尔高原）就到了阿拉伯。中原内地的丝绸宝物就是经过这条路运往世界的。

中原自古通西域。在遥远的大汉，武帝刘彻派使臣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古道。此后汉武帝西征北伐，在这里建立了“使者校尉”修筑了汉长城的座座烽火台。它像矗立在西北边陲的卫士，护卫着中原，保证了队队商旅驼铃不断。盛唐时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负责管理西北边疆的地方行政。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畔的碎叶镇。日后，他带着西北人骨子里的豪放、血液中的深情，走遍了祖国的青山秀水，写出了瑰玮绚烂的诗篇。到了清代，享有十全武功盛誉的乾隆皇帝出兵平叛了准噶尔贵族之间的

内乱，将西域划归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至此，西域成了祖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语言复杂，形势险要的边陲重镇。

那时候，清王朝疆域辽阔，海内升平。从东到西，自南往北，到处是田园牧歌，文恬武嬉。然而，当朝野上下还在起劲地歌颂列祖列宗拓疆平逆，十全武功的时候，当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都自我陶醉在“天朝上国”那甜蜜的梦想的时候，中国却步入了多事之秋。这正是：

西疆好地方，
草丰牛羊壮。
不料阴云起，
窥伺有豺狼。

1 西线多战事

19 世纪的世界，是不平静的世界。伴随着工业革命机器轰鸣的是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隆隆炮声。在西方世界，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是英国。至 19 世纪中叶，它已经可以用机器生产机器，生产力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产品迫切地需要巨大的市场来消化，所以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向海外扩张的势头更猛，步伐更快。执政的自由党首相帕麦斯顿坚决主张把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海外扩张，而不去进行国内的民主改革。所以在他执政的岁月，英国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取得了控制土耳其和自由出入黑海的权利；英国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牢牢控制了这块辽阔富饶的殖民地；英国先后发动了两次对华侵略的鸦片战争，取得了通商贸易，领事裁判、协定关税种种特权；英国在伊朗，在缅甸，在南非，在埃及，在埃塞俄比亚，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几乎在整个世界，到处都有它扩张的触角。英国人从海外殖民地掠来的巨额财富，引起了全世界资

产者的垂涎。他们群起效尤，纷纷赶到世界各地去争抢肥肉。他们知道，餐桌上的佳肴已经剩的不多了，如果再不动手的话，就轮不到自己也分一杯羹了。于是他们争先恐后，唯恐捞不到油水。

沙俄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早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前，他们奉行的就是一套向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一方面，他们想用海外扩张来转移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转嫁危机；另一方面，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俄国的资产阶级影响越来越大，他们苦于农奴制条件下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想仰仗着沙皇政府向外扩张而开拓海外市场。除了上述两方面动力之外，俄国人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还戴上了“欧洲宪兵”的钢盔，这样他们向外扩张的欲望更无比的强烈。

由于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国家，它的扩张之手就同时向欧洲、亚洲两个方向出击。

1853年至1856年，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沙俄的对手是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国，本来俄国人想大举南下土耳其，趁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控制欧洲的咽喉通道，这样就可以纵横黑海、南下地中海觊觎巴尔干。不料，这个野心被英、法两国所遏制，俄国人失败了。他们向欧洲扩张的势头被阻止了。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沙俄国内民情不稳，整个封建农奴制岌岌可危。为了掌握主动权防止下层革命的发生，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

废除农奴制并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改革后的沙俄国力增强，扩张更具备了条件。这以后沙俄把扩张的矛头对准中亚，加入了列强在亚洲霸权的争夺战。

沙俄侵吞中亚及中国西北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沙俄的军事力量就不断朝中国巴尔喀什湖（现哈萨克斯坦境内）以东、以南广泛渗透。在这一带，他们又是武装强占，又是修建堡垒，大有长期驻扎的架式。对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清政府先后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提出照会以示抗议，但是终因西北薄弱的防御能力而未能奏效。结果事实上默许了沙俄对这一地区的占领。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沙俄西进受阻掉过头来向东南推进。这个时候，俄国人想的是先把巴尔喀什湖已占的地盘牢牢控制住，然后再向东南，也就是中国的吹河流域和特穆尔图淖尔湖地区挺进。吹河流域和特穆尔图淖尔，是中国西北疆少数民族柯尔克孜族世代聚集之地。它位于天山北麓，风光秀美、富庶丰饶。往南经图鲁噶尔特山口可以到达南疆的喀什噶尔，那里是一片绿洲。沙俄早就梦想着有一天把这块丰饶的土地纳入他们的版图。1856 年哥萨克的骑兵向东挺进，他们长趋直入，一直跑到特穆尔图淖尔湖畔，想在这里修筑他们的堡垒。可是，柯尔克孜人民拆毁了他们的堡垒，把他们轰出了自己的家园。沙俄政府